

公共视频监控对社区居民安全感的影响： 基于平安北京数据的实证研究

李欣岩

摘 要：公共视频监控会对社区居民安全感产生影响，公共视频监控覆盖越广，社区居民安全感越高。同时，影响社区居民安全感产生的因素还包含社区志愿防控力量、社区居民间熟悉状况以及社区警务力量，具体表现为：社区志愿防控力量越充足、社区居民间熟悉程度越高、社区警务力量越完备，居民的安全感越高。根据研究结果，可从加强公共视频监控标准化建设、完善多元共治主体责任、提高社区情感治理水平、优化社区警务力量的配置四个方面提出提升社区居民安全感的对策，为平安中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安全感；公共视频监控；基层治理；实证分析

一、引言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科技创新风起云涌。充分利用科技赋能公安工作，是有效提高创造性贯彻落实能力、推动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智能化与自动化是科技赋能公安工作，打造新一代智慧警务的应有之义，而无论是智能化还是自动化，都离不开公共视频监控，公共视频监控作为智慧警务最前端的感知层，在智慧警务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随着智慧警务的发展，越来越多公共视频监控进入公众视野，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摄像头成为民众对于治安发展的初步感知，它们就像一双无形的眼睛，时刻关注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捕捉着可能威胁公共安全的信息^[1]。从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受理治安案件数以及刑事案件破案率不难看出，公共视频监控的普及对于公安业务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公共视频监控作为智慧警务建设中最前端的感知层，是老百姓对于智慧警务感知的第一印象，同时公共视频监控的大量使用也引发了普通民众对于权利与自由的隐忧。

当前，智慧警务的建设需要公共视频监控，但民众对于公共视频监控有所戒备。对此，本文提出如下问题：公共视频监控究竟会对社区居民安全感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多数讨论仅停留在感性层面，缺乏数据支撑导致可信度不足，需要对此进行实证研究方能得到更确信的答案。或许是受限于实证数据的匮乏，目前鲜有这一方向的研究，本文将使用 2021 年平安北京调查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检验。

二、文献回顾

（一）公共视频监控

《中国监控摄像头线上零售市场月度追踪》报告指出，2024 年 5 月，中国监控摄像头线上市场

销量为 214 万台，销额为 5.0 亿元。对于政府而言，在“平安城市”“智慧城市”等重大项目的推动下，公共视频监控系统的运用已成为常态。在世界范围来看，随着安全形势的日益严峻，各国对视频监控系统的的需求空前高涨，部署的摄像头越来越密集。根据 2024 年 2 月 DataProt 公布的数据，北美国家拥有 28.5% 的全球市场份额，欧洲以 18.3% 位居第二，大多数国家通过布设安全摄像头打击道路暴力行为、监控交通、防止故意破坏行为并解决其他公共安全问题^[2]。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将公共摄像头的使用作为打击犯罪和维护治安的重要手段。

学界对于公共视频监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民权力风险方面。李柏正认为，监控系统的大规模运用给公民隐私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3]；董皞等认为公共视频监控使人们面临着个人信息遭受过度收集、非法泄露和不当利用的风险^[4]；赵敏认为公共视频监控会侵犯公民的数据权利，加剧数字鸿沟^[5]。王朝帅认为相关技术缺乏严格的法律约束，监控系统存在演变为权力监控工具的风险^[6]；过度依赖技术监控还可能削弱社区自主管理能力，将人际信任转化为机械管控，降低社区居民幸福感。

以上不难看出，学界对于公共视频监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风险、危机等负面影响，但对于公共视频监控对居民治安心理的影响学界并未展开讨论。

（二）安全感

安全感是治安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7]，最新定义指出，治安是由国家主导、社会共同参与，以维护国家政权稳定，保障公民人身、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善良风俗不受侵害为目标，最终使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达到一种有条理、不紊乱、无危险的状态。因此，治安的内涵丰富，不仅涵盖政治安全、财产安全，同时也包含居民的心理安全等维度。其中，心理安全指居民在社区生活的主观安全感受，即安全感。

影响居民安全感的因素有哪些？陈崇贤认为夜间户外环境对居民安全有一定影响^[8]；林浩曦等认为人流量以及绿视率、标识设施密度、界面透明度等会对于安全感产生一定的影响^[9]；干一卿认为社区中外来居民的比例会对本地居民社区安全感知产生一定影响^[10]。可以看出，学界对于安全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环境领域，对于社会领域，尤其是近年兴起的公共视频监控并未涉及。

（三）公共视频监控对安全感的影响

公共视频监控对安全感的影响包含众多的技术与社会因素。Adi Manor 等从无响应机器与安全感的角度出发，分析关注与响应等机器行为对于人类安全感的潜在影响，梳理了监控类机器与安全感的的影响关系^[11]；S. McLean 等指出视频监控技术通过提高犯罪成本、降低犯罪收益、减少犯罪借口等可视性功能预防和控制犯罪，进而增强居民安全感^[12]；张宇英通过对比分析提出，公共视频监控可通过预防不良行为增强安全感^[13]；杨子飞从正效应与负效应两个方面，辩证分析了公共视频监控对于安全的影响^[14]。综合上述文献可知，公共视频监控对安全感的影响是复杂的，现有研究缺乏充分的实证支撑，仍有进一步探讨公共视频监控对社区居民安全感影响的必要。

（四）本文的假设

根据前述研究，本文的假设为：公共视频监控对社区居民安全感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将运用 2021 年平安北京数据来验证这一假设，其中第三部分为变量说明与回归结果分析，第四部分为 LR chi 检验和多重共线性检验，第五部分为本文的讨论和结论。

三、变量说明与回归结果分析

在以往研究中，影响社区居民安全感的因素被归纳为志愿防控力量、社区内居民熟悉状况和警务防控力量，本文将在控制上述因素的基础上，测度公共视频监控对社区居民安全感的影响。

（一）变量说明

1. 关键变量：公共视频监控

本文的关键变量是公共视频监控。这一变量来自 2021 年平安北京问卷的第 B8 题：“您所居住社区的视频监控系统运行是否有效？非常有效、比较有效、一般、不太有效、无效”。

公共视频监控的有效性是居民安全感的主要来源，有效性高意味着监控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并且民众认为其设置有一定必要性。对于公共空间而言，公共视频监控系统有效运行，能够实时监控公共区域的活动，使潜在犯罪者意识到自身行为可能被记录，从而产生威慑作用，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从民众心理角度来看，明确公共区域处于监控之下，会让普通居民在心理上感到更加安心，这种心理效应即使在实际犯罪率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也能提升居民的安全感。

而对比监控的数量和密度，过高的监控数量和密度往往导致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且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即随着监控数量密度的增加，其对居民安全感的提升作用会逐渐减弱，如前所述过高的密度会引发居民对于隐私泄露的担忧。这种情况下，监控数量密度的增加不仅无法提升居民安全感，反而可能降低居民对公共环境的满意度和安全感。

2.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社区居民安全感。这一变量来自问卷的 B24 题“总体来看，您认为您所居住社区的治安状况怎样？”选项是“很差”“比较差”“一般”“比较好”“很好”，取值分别是 1-5。

表 1 变量的定义

变量名		项目数 / 单位	定义
被解释变量	社区居民安全感	5	对社会治安状况的满意度：很差 =1，很好 =5，1-5 之间有序渐进变化
解释变量	公共视频监控	5	所居住社区的监控系统运行有效程度：无效 =1，非常有效 =5，1-5 之间有序渐进变化
控制变量			
个体属性	性别	2	虚拟变量：男性 =1、女性 =0
	年龄	岁	周岁
	婚姻状况	2	虚拟变量：已婚 =1、未婚 =0
	受教育程度	年	样本受教育的年限
	户口	2	虚拟变量：北京户口 =1、非北京户口 =0
志愿防控力量	看到治安志愿者频率	3	看到治安志愿者频率：见不到 =1，偶尔见到 =2，经常见到 =3，1-3 之间有序渐进变化
社区内居民熟悉状况	社区内居民熟悉程度	5	社区内居民熟悉程度：基本不认识 =1，认识一小部分 =2，大约认识一半 =3，大部分认识 =4，基本都认识 =5，1-5 之间有序渐进变化
警务防控力量	警务室开放的频率	3	警务室开放的频率：不开放 =1，偶尔开放 =2，经常开放 =3，1-3 之间有序渐进变化

3. 控制变量

回归模型的控制变量分为四组：个体属性变量、志愿防控变量、熟悉度变量和警务防控变量。

(1) 个体属性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口、教育程度。

(2) 志愿防控变量。通过志愿服务来提升社区内的公共服务能力，从而提升社区居民的安全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区治理方式。在中国，志愿防控的方式有很多途径，如建立志愿服务站、周期性进行志愿服务活动等。本文选取的变量是“见到志愿服务者的频率”，来自问卷 B3 题“在您所居住的社区中，您会经常看到带有红袖标的治安志愿者吗？见不到、偶尔见到、经常见到”，本文假定，看到治安志愿者频率越高，志愿防控力量越强。

(3) 熟悉度变量。对周围人的熟悉情况被认为是人类获得安全感的重要来源之一^[15]。本文选取的变量是“对周围居民的熟悉程度”，来自问卷的第 B10 题“您对您所居住社区中居民的认识程度怎么样？基本不认识、认识一小部分、大约认识一半、大部分认识、基本都认识”。

(4) 警务防控力量。警务力量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同样也是居民获得安全感的重要来源之一。有学者研究指出，一个地区警务防控力量是衡量一个地区治安状况的关键指标^[16]。本文所适用的变量是警务防控力量，来自问卷第 B16 题：“据您观察，您所居住社区的社区警务室开放的频率如何？”本文假定看到社区警务室开放的频率越高，社区的警务防控力量越强。

(二) 描述性统计分析

1. 北京地区的治安状况

在各种政策文件中，治安状况良好被视为当地公安工作的重要因素，同时社区治安状况是衡量社区安全感高低的重要指标。回顾历史经验可以为未来的规划提供借鉴，《平安北京建设发展报告（2021）》显示，从调查问卷角度来看，2021 年在调查 1200 人中，有 37.5% 的人认为其所在社区的治安状况很好，有 46.17% 的人认为其所在社区的治安状况比较好，有 13.58% 的人认为其所在社区的治安状况一般，有 1.83% 的人认为其所在社区的治安状况比较差，有 0.92% 的人认为其所在社区的治安状况很差（如图 1 所示）。以上数据表明，大多数调查参与者认为社会治安状况“很好”或“比较好”，充分说明公众对社会治安状况的整体评价较高，安全感较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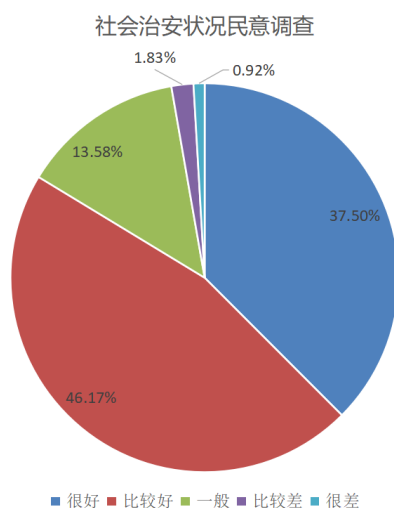


图 1 2021 年北京治安状况满意度调查

2. 研究变量分析

本研究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涵盖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户口、志愿防控力量、居民熟悉程度、警务防控力量、公共视频监控以及社区居民安全感等十个变量（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均值 / 比例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别	0.49	0.50	0	1
年龄	50.36	16.12	17	100
婚姻状况	0.87	0.34	0	1
受教育程度	12.51	3.55	6	19
户口	0.69	0.46	0	1
志愿防控力量	2.43	0.66	1	3
居民熟悉程度	3.19	1.37	1	5
警务防控力量	2.4	0.64	1	3
公共视频监控	3.94	1.00	1	5
社区居民安全感	4.18	0.80	1	5

人口统计学特征。样本显示男性占比 49%（均值 =0.49，标准差 =0.50），女性占比 51%，性别比例基本均衡，符合基本人口学特征。样本平均年龄为 50 岁（标准差 =16.12），年龄范围在 17 岁至 100 岁之间。这表明样本涵盖了较广的年龄分布，平均年龄处于中老年阶段。样本中已婚个体占比 87%（均值 =0.87，标准差 =0.34），表明样本以已婚人群为主。样本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2.51 年（标准差 =3.55），受教育程度范围在 6 年至 19 年之间。这表明样本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可能普遍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拥有本地户口的个体占比 69%（均值 =0.69，标准差 =0.46），表明样本中本地户籍人口占多数。

控制变量特征。志愿防控力量的平均得分为 2.43（标准差 =0.66），得分范围在 1 至 3 之间，该变量反映出居民看到治安志愿者的频率，得分较高，表明较多人在日常中看到治安志愿者。居民间相互熟悉程度平均得分为 3.19（标准差 =1.37），得分范围在 1 至 5 之间，表明居民间熟悉程度属于中等偏上水平。警务防控力量的平均得分为 2.40（标准差 =0.64），得分范围在 1 至 3 之间，表明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警务室开放，也反映出社区内警务力量相对充足。

（三）计量模型

由于本文所用数据对安全感的测度是以“很差”“比较差”“一般”“比较好”“很好”衡量的，各程度取值分别为 1、2、3、4、5，这五个选项之间并非互相独立，而是按照信任程度的顺序来排列的。因此，本文采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来估计公共视频监控对社区居民安全感选择概率的影响。

Ordered Probit 模型的基本方法如下：当被解释变量 Y_i 有 s 个选择项时， $Y_i=j(j=1, 2, \dots, s)$ ，且 $1 < 2 < \dots < s$ 由假想潜变量 Y_i^* 的值 ($\alpha_{j-1} < Y_i^* < \alpha_j$ ， α_j 为阈值) 所决定。 $Y_i=j$ 的概率可写为： $P(Y_i=j|X_i)=F(\alpha_j - \beta X_i) - F(\alpha_{j-1} - \beta X_i)$ ，其中 $F(\cdot)$ 表示累积分布函数。所有 Y_i 值的概率相乘得到似然函数，对对数似然函数求最大值就得到各参数的最大似然估计值^[17]。

（四）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的回归模型包括两个模型，模型 1 为基础模型，模型 2 是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关键变量“公共视频监控”。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公共视频监控		0.410*** (9.65)	0.372*** (6.21)	0.450*** (7.31)
年龄	-0.004 (-1.17)	-0.002 (-0.60)	-0.001 (-0.29)	-0.003 (-0.65)
性别	-0.141* (-1.81)	-0.165** (-2.09)		
婚姻状况	-0.047 (-0.33)	-0.026 (-0.18)	-0.100 (-0.53)	0.101 (0.44)
受教育程度	-0.010 (-0.83)	-0.009 (-0.68)	-0.003 (-0.18)	-0.013 (-0.68)
户口	-0.066 (-0.68)	0.034 (0.35)	-0.000 (-0.00)	0.067 (0.44)
志愿防控力量	0.214*** (3.34)	0.207*** (3.18)	0.217** (2.41)	0.190** (1.99)
居民熟悉程度	0.112*** (3.50)	0.064* (1.94)	0.057 (1.29)	0.079 (1.56)
警务防控力量	0.457*** (7.16)	0.426*** (6.58)	0.434*** (4.87)	0.429*** (4.46)
样本数	867	867	444	423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双尾检验，括号中为标准误）。

第一，从模型 1 的结果可以看出，志愿防控力量、居民熟悉程度和警务防控力量这三个因素对治安状况满意度都产生了显著影响，说明北京地区治安满意度高，一部分原因在于志愿防控力量多、居民熟悉程度高以及警务防控力量充足。从模型 2 的结果可以看出，公共视频监控对社区居民安全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回归系数为 0.410），即公共视频监控有效利用越多，社区居民安全感越高。由此本文的假设得到了证明。

第二，在模型 2 中可以发现，个人属性变量群中对于治安状况满意度的影响有所不同。从中可以看出，性别与治安状况满意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考虑到性别对于安全感的不同影响，本文将受访者区别为男性和女性来分别考虑，结果见模型 3 和模型 4。在男性群体与女性群体的治安状况满意度影响因素回归中，关键变量民众对于公共视频监控对治安状况满意度都呈显著正向影响，这与未区分男性与女性时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说明民众对于公共视频监控对治安状况满意度的影响与性别因素是同时存在的。在模型 3 和模型 4 中，主要变量无大的差异，故本文以模型 2 为主要解释模型。

第三，在居民熟悉程度变量中，将性别区分开之后，回归结果表现为不显著，这与预期结果相差较大。一般意义上，女性较男性更加感性，更易在群体的熟悉感中获得安全感，其与因变量应当有一定的相关性。出现这一结果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样本量减少，区分男性和女性之后，样本量缩小一半，加之前期对于缺失值的处理，导致样本量过少，统计功效下降，使得原本显著的结果不

再显著；二是男性和女性在对待“居民熟悉程度”的态度上可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导致该变量在分性别的模型中不再显著。针对这一问题，后续可以开展性别差异分析、模型诊断、变量关系探讨等，通过这些步骤深入理解为什么“居民熟悉程度”在区分开性别之后表现为不显著的原因，并揭示性别影响社区治安状况满意度的内在机制。由于本研究重点在于公共视频监控对于社区居民安全感的影响，故不再进行这方面的探究。

第四，在志愿服务变量中，经常看到志愿者的受访者，其治安状况满意度显著高于不经常看到志愿者的受访者（其回归系数为 0.207，z 值为 3.18）。

第五，警务防控力量对于社区居民安全感有显著影响，经常看到警务室开放的受访者治安状况满意度显著更高（其回归系数为 0.426，z 值为 6.58），这说明警务防控力量越充足，社区居民的安全感越高。

四、LR chi2检验和多重共线性检验

（一）LR chi2 检验

在本次研究中，采用了似然比卡方检验（LR chi2 检验）来评估模型的拟合优度。该检验旨在比较无约束模型（包含所有潜在自变量）与受约束模型（可能省略部分自变量）之间的拟合差异（如表 4 所示）。

表 4 LR chi2 检验结果

统计量	值
LR 卡方值	195.84
自由度	9
显著性水平	<0.0001

检验结果显示，LR chi2 统计量为 195.84，对应的自由度为 9。这一统计量反映了两个模型之间对数似然值的差异，经过卡方分布的转换后得到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该统计量远大于临界值，表明模型之间的拟合差异是显著的。

进一步地，Prob > chi2 的值小于 0.0001，这一极小的 p 值远低于常用的显著性水平（如 0.05）。这意味着在原假设（即受约束模型是正确的）为真的情况下，观察到当前或更极端的 LR chi2 值的概率几乎为零。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原假设，认为无约束模型的拟合效果更优。

（二）多重共线性检验

本研究通过多种统计指标对数据进行了多重共线性诊断，以评估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严重的线性关系，从而可能影响回归模型的稳定性和解释性（如表 5 所示）。

表 5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变量	VIF	SQRT VIF	Tolerance	R-Squared	Eigenval	CondIndex
公共视频监控	1.06	1.03	0.9449	0.0551	0.4972	4.1994
年龄	1.75	1.32	0.5707	0.4293	0.2633	5.7708
性别	1.02	1.01	0.9800	0.0200	0.1473	7.7152

续表

婚姻状况	1.42	1.19	0.7059	0.2941	0.1120	8.8474
受教育程度	1.33	1.15	0.7505	0.2495	0.0690	11.2753
户口	1.37	1.17	0.7322	0.2678	0.0507	13.1477
志愿防控力量	1.13	1.06	0.8879	0.1121	0.0427	14.3275
居民熟悉程度	1.23	1.11	0.8109	0.1891	0.0405	14.7120
警务防控力量	1.14	1.07	0.8785	0.1215	0.0090	31.1823

1. 方差膨胀因子 (VIF) 和容忍度 (Tolerance) 分析

VIF 是衡量一个自变量被其他自变量预测程度的指标，而容忍度 (Tolerance) 是其倒数。一般来说，VIF 大于 10 或容忍度小于 0.1 表明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分析结果表明，所有自变量的 VIF 值均远低于 10，其中最大值为 1.75 (对应变量：年龄)。平均 VIF 值为 1.27，进一步表明数据中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所有变量的容忍度值均接近 1，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

2.R 平方分析

R 平方值越接近 1，表示该自变量与其他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越强。

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 R 平方值均较低，最高值为 0.4293 (对应变量：年龄)。这表明各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较弱，进一步支持了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的结论。

3. 特征值 (Eigenvalue) 和条件指数 (Condition Index) 分析

条件指数大于 30 通常被认为是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的标志。

分析结果显示，本次研究最大的条件指数为 31.1823，略高于 30 的临界值。然而，考虑到其他诊断指标均未显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我们认为该条件指数虽然略高，但并不足以导致模型的不稳定。

综上所述，基于 VIF、容忍度、R 平方、特征值和条件指数的综合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本研究数据中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尽管某些变量的 VIF 值略高，且最大条件指数略高于临界值 30，但整体而言，多重共线性对回归模型的影响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认为所建立的回归模型结果是可靠和可解释的。

五、研究结论与建设路径

(一) 主要结论

本研究基于北京地区居民的实证数据，定量考察了影响社区居民安全感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地区居民对社区治安状况的总体满意度处于较高水平。这种高满意度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共视频监控的有效部署和利用，显著提升了公共空间的安全感；二是社区的志愿防控力量，其增强了社区治安的群防群治能力；三是居民对社区治安状况的熟悉程度，体现了居民对社区安全环境的感知和认可；四是警务防控力量的有效投入，强化了专业的治安维护能力。

(二) 提高社区居民安全感建设路径

1. 加强公共视频监控标准化建设，提高公共视频监控普及率。一方面，实现公共视频监控的高

质量发展,需要明确各主体职责、权限,较为完善的标准能够帮助公共视频监控领域实现长足发展。因此,可以通过立法、制定行业标准等手段,完善公共视频监控领域的各企业、政府部门、团体组织的职责与权限,将其纳入制度化发展的轨道。另一方面,提高公共视频监控的普及率对于社会治理和民众安全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数字化时代,更多的公共视频监控意味着更加精细的社会治理能力,更安全的居民社区。

2. 完善多元共治主体责任,优化社区志愿服务力量。多元共治模式通过调动社会团体等主体的自主积极性^[18],尤其是调动社区志愿服务主体的积极性,不仅可以培育公民民主意识,而且可以弥补警务力量不足而导致社区居民安全感下降。要实现优化社区志愿服务力量,可以从政府、社区、专业三方面推进^[19]。在政府层面,应完善社区志愿服务的政策供给,做好顶层设计;在社区层面,将志愿主体作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多元共治的重要主体,不仅要关注志愿者本身成长,也要注重志愿服务队伍的发展与完善;在专业层面,志愿队伍要紧跟社区居民安全需求,在不断规范化、专业化的过程中,打造特色安全志愿服务品牌。

3. 提高社区情感治理水平,回归传统乡约社会。埃里克森在《无需法律的秩序》中提到“长期持续且亲密的关系是非正式规范发挥作用的基础。”同样,提升社区的道德水平、增加居民间的熟识程度,可以发挥法律之外的非正式规范,这是人们获得安全感的重要来源。传统的乡约社会,便是熟人社会的产物,居民彼此之间能够谙熟“人情世故”,保持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让情感成为调整社区居民彼此关系的主要力量,在日常举手投足之间获得安全感。

4. 优化社区警务力量的配置,增强基层治安防控能力。研究表明,社区警务力量与社区居民安全感有着密切联系,优化社区警务力量,需要由表及里进行变革。一方面,需要基层政府加大社区警务的资金投入,让民警愿意从办公室走到百姓社区中。而现实是公安机关的大量人力、财力资源倾斜在执法办案上^[20],社区警务在经费和资源的投入十分薄弱,这严重制约了社区警务力量的配置。另一方面,强化社区民警在社区工作中的协调能力。社区警务工作作为解决矛盾纠纷、流动人口等问题的“先锋队”,应当能够克服各部门间不同隶属关系的壁垒,形成各主体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并通过其核心地位,凝聚更多社会力量,提升社区居民安全感。

(三) 研究局限与启示

受时间、规模等因素限制,本文的样本数量与样本覆盖面均较为有限,也未对社区进行精确分类,无法避免不同社区的差异性问题的。同时,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性别与居民安全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受制于研究主题的限制,并未对其成因进行探究。因此,后续研究应进一步扩大研究样本的范围与规模,弥补因样本数量不足而导致遗漏变量问题,同时厘清影响社区居民安全感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不断深化对居民安全感的理解,为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李欣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Leo 张大志. 如何理解治安管理中的“智慧治安”和“智能防控”理念? [EB/OL]. (2024-11-15)[2025-05-19].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5745865978822151&wfr=spider&for=pc>.

- [2] 程乐. 我国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体系的布局与优化[J]. 人民论坛, 2024(23):68-71.
- [3] 李柏正. 公共视频监控与隐私权的法律保护[J]. 比较法研究, 2024(6):190-206.
- [4] 董皞, 王裔莹. 论公共场所监控设备收集个人信息泛化的规制进路——兼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6条[J]. 法律适用, 2023(10):9-16.
- [5] 赵敏. 公共视频监控的大数据伦理问题——以个人信息安全为中心[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6(1):97-103.
- [6] 王朝帅. 公共场所摄像头该怎么装? 怎么管?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实施半月调查[N]. 邵阳日报, 2025-04-18(007).
- [7] 李小波. 治安学范式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7.
- [8] 陈崇贤, 熊心蕊, 林广思, 等. 夜间户外环境对居民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J]. 风景园林, 2025, 32(7):21-29.
- [9] 林浩曦, 王瀚笙, 赵婷, 等. 城市高强度片区安全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25, 32(6):10-15+33.
- [10] 干一卿. 分化的接纳: 中国城市社区外来居民比例与本地居民社区安全感知[J]. 浙江社会科学, 2024(7):71-85+157-158.
- [11] Manor A, Megidish B, Todress E, et al. A Non-Humanoid Robotic Object for Providing a Sense Of Security[C] 2022 31st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 and Human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RO-MAN), Napoli, Italy, 2022: 1520-1527.
- [12] McLean S J, Worden R E, Kim M S. Here's looking at you: An evaluation of public CCTV cameras and their effects on crime and disorder[J]. Criminal justice review, 2013, 38(3):303-334.
- [13] 张宇英. 公共视频监控资产全生命周期绩效评估体系构建研究[J]. 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 2026(4):125-128.
- [14] 杨子飞. 论平安监控的“负安全效应”——一项基于国外文献的研究[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0(3):59-66+80.
- [15] [美] 罗伯特·C. 埃里克森. 无需法律的秩序[M]. 苏力,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 [16] 卢国显. 城市治安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策——以泰州为例[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3(4):124-132.
- [17] 苏振华, 黄外斌. 互联网使用对政治信任与价值观的影响: 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5(5):113-126.
- [18] 江必新. 关于多元共治的若干思考[J]. 社会治理, 2019(3):5-15.
- [19] 黄晓星, 吴小芹. 社区志愿服务的多元制度逻辑及实践路径——以广州市B社工站为例[J]. 社会科学辑刊, 2023(6):130-140.
- [20] 杨耀辉, 田俊俊. 社区警务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阻滞因素及其化解之策[J].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2024, 36(5):98-108.